

回忆篇

忆清华园的音乐生活

○ 茅沅（1950届土木系）

我自幼喜爱音乐。中学毕业后若照自己的爱好理应进大学专习音乐，然而当时在我的思想中总觉得靠音乐可能没有饭吃，于是就选择了学科技的道路。1945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一年后，抗战胜利，清华复校，我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转入土木系。1950年毕业。

清华没有音乐系，但对学生的音乐活动很重视。复校后成立了音乐室，由张肖虎先生任导师。音乐室设立在一座灰砖二层建筑里，地点在化学馆之西，故名：“化西楼”，俗称“灰楼”（现已拆除）。在张肖虎先生精心安排下，音乐室成立了军乐队、管弦乐队、合唱团、民乐团等。开办了钢琴、小提琴、声乐等课。音乐室的教师有姚锦新、戴世铨、王震寰、李致中、赵行达、刘光亚、阎铭等。并请来校外音乐专家沈湘、老志诚、关紫翔、库布卡、祁玉珍、斯塔维斯基等任教，逐渐形成规模。各音乐团体排练出不少音乐节目，在校内大礼堂以及北平城里演出音乐会多次。那时候被称为文化故都的北平，除清华大学的管弦乐队之外没有第二家了。乐队排练演出过海顿的第49交响乐《警愕》、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由我主奏钢琴）、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资中筠主奏钢琴）等。张肖虎先生极力提倡民族音乐，故而合唱团除西洋名曲外多演唱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尤其清华校友的作品，如黄自的《长恨歌》、《旗正飘飘》、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等。黄自、赵元任都是清华早期校友，而张肖虎先生则是清华土木

系37届毕业，而后转做音乐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步了张先生的后尘。张肖虎先生有着很深的音乐文化修养，理论、作曲、指挥等方面均有颇高的成就，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尽了毕生的精力。他非常希望能在清华成立一个音乐系，但终未如愿。1949年夏，他离校去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并推荐陆以循先生接任音乐室导师。陆先生也是清华校友，小提琴造诣很高。我虽然未直接受业于张肖虎先生，但参加了他指导的一些音乐活动，都从中受益匪浅。我还有幸请他改过我的音乐习作。虽然仅一两次，但都给我极大的启发。姚锦新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后去德国、美国留学多年。1947年回国在清华西语系教德文，同时在音乐室教钢琴。很幸运我是她的学生之一。姚先生教授的钢琴技法与我以前的奥地利教师教的方法相通且更系统化。姚锦新先生教课极其认真，每堂课都超过两小时。我师从姚先生不到一年，仅很严格地学了一首曲子，然而所给我的教益却是受惠终身的。

军乐队在清华是最有传统的。复课后军乐队重建是由韩德章先生（清华农学院教授）任指导。他亲自编写乐谱由简到繁，为军乐队打下良好的基础。管乐器的个别授课则由刘光亚、赵行达两位先生担任。在许多活动中如校庆、运动会、庆祝解放进城宣传、开国大典、五四青年节去天安门游行等，都有军乐队参加。解放后每周在大礼堂上大课，军乐队坐在台上，课前课中吹奏助兴，很受同学们的欢迎。1949年刘光亚先生离开清华，我曾暂代指挥。1950年后，学校

请来周乃森先生，他是军乐专家，在校40余年苦心经营，把清华军乐队水平大大提高，发展得极为可观。这是后话。

当年在清华有许多文艺社团。我们爱好音乐的清华人组织了一个社团“清华音乐联谊会”，联谊会有一首会歌是由陈平（哲学系）作曲，由我填词，歌词如下：“愿大家同学习，愿歌声同普及，愿音乐若家庭，你我兄弟姐妹”。联谊会举办过许多活动，如约请校外音乐家来校开音乐会，教唱歌，为话剧配乐（记得有一次是西语系同学排演英语话剧，英若诚担任主角之一），甚至奏结婚进行曲（李国鼎先生结婚时就是约我们演奏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音乐联谊会组织每周一次的音乐欣赏，请温德教授（Winter）讲解。温德先生是西语系教授，终身未娶，音乐知识丰富，家中唱片很多。每周一个晚上我们聚会在温德先生家里，先听他讲解，再欣赏音乐。我的许多音乐知识都是从这每周一次的音乐欣赏中得来的。

土木系同班同学中有不少人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仅我记得参加乐队的有黄昭度（圆号）、何曾佑（圆号、长号）、马玉璋（低音号），比我们高班的有钟安度（长号）、邓频喜（大号）等人。宋载钧（现名宋扬）是当年清华合唱团的骨干分子，唱男高音，并担任合唱团团长。他工作热情、细致，又写得一手好字，很多歌谱都是经他刻写蜡纸印出来的。

古人云：“以文会友”。音乐也是如此，有极大的凝聚力。我们当年一同搞音乐的部分在京校友，每逢校庆总要在清华相聚一次。1991年母校80周年校庆，大家在音乐室的一间大教室里（原校医院旧址）举行了小型音乐会，吹、拉、弹、唱豪情不减当年。晚上在大礼堂举行80周年校庆演出，最后一个节目由清华管弦乐队演奏我写的《瑶族舞曲》，并由我亲自指挥。这时的乐队阵容、技术水平较之当年我在校时的乐队已大



1991年80周年校庆，老队友们返回母校与校长书记在一起。左起：57级刘希拉、校长张孝文、47级茅沅、32级张肖虎、音乐室教师周乃森、党委书记方惠坚

大超过了。童诗白（电机系）、虞锦文（建筑系）、苏其圣（体育部）等几位当年的老乐队队员，此时均已年逾花甲白发苍苍，也登台参加演奏。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激动万分。

1950年夏毕业，我、宋载钧、万周（已故）、马瑞振（已故）、胡家恒几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工程局。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什刹海疏浚及修建护岸。虽然如此，我更大的兴趣却仍在音乐方面。各行各业都是革命工作，有几位原来在一起搞音乐的同学陈平、杜式谷（后改名石谷，历史系）、岑乐驹（电机系）等，一年前就离校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搞文艺工作了。在他们的鼓励之下，我下决心改行参加文艺团体成为一名音乐工作者。

近50年的岁月在风风雨雨中过去了，很惭愧在音乐领域没有做出卓越的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历次政治运动文艺界都是重灾区，所受干扰和损失最大，“文革”期间就更不用说了。主观上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勤奋是主要原因。有人说我放弃了所学专业改行去搞音乐是个错误。可是我始终不悔，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改行，我疏远了曾经谆谆教我的师长和同班同学。现在大家都年逾古稀，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也有人说我当年进清华就是错误。对此我不仅不后悔而是感到万分幸运。清华的精神和传统，教我育我让我知道如何为学，如何为人。能作为一个清华人，我永远感到无比的光荣和骄傲。